

---

# 新聞的異化危機

## THE CRISIS OF THE ALIENATED PRESS

習 賢 德

---

### 摘 要

馬克思雖然視新聞媒介為鬥爭資本主義的工具，但其手稿所揭示的異化概念卻直接刺中資本主義社會宰制人類的因果。新聞事業以商品貨幣的形式維繫，必然危及陳義甚高的新聞倫理與編採守則，因而形成新聞界本身為牟取名利或保衛其意識形態，所衍生的五個新聞異化的危機。廿一世紀的人類文明將廣泛承受「第二代媒介」興起的衝擊，新媒介的技術躍升是否全然代表進步，而閱聽大眾又該如何從更多更快的資訊中，揚棄瑣碎、扭曲和虛假的部份，再度珍視思辯能力並堅守道德防線，以突破傳媒的制約和異化的宿命，新聞從業人員的專業堅持，終將扮演左右人類前途的重要角色。

---

本文作者 習賢德 台大三民主義研究所博士班研究生，資深記者，輔大大眾傳播系及政大新聞系兼任副教授。著作有《孫中山先生與革命思想的傳播》、《風向集》、《美國進步主義改革運動及對孫中山先生的影響》、《清末中文報刊呈現的美國形象》、《孫中山先生與基督教》、《台灣新聞事業問題解析》、《新聞報導中公民意識的個案分析》。



## 前 言

馬克思與恩格斯認為，現代傳播的急遽發展是商品經濟向全世界拓展的結果，他們習慣於在世界的範圍內，將「物質交往」與「精神交往」融合在一起考察傳播現象，因而形成追求心靈自由的開放觀念，認為報刊的使命「是公眾的捍衛者，是針對當權者的孜孜不倦的揭露者，是無處不在的眼睛。」<sup>1</sup>

西方馬克思主義於本世紀廿年代，於中歐、西歐思想界興起之後，促使西歐學者將一向強調政治與經濟的正統馬克思主義（亦即「科學的社會主義」），轉向探究哲學、文化及藝術的馬克思主義（亦即「哲學的共產主義」）；其中，尤以法蘭克福學派所闡揚的批判理論，以多學科或跨學科為基礎的嶄新社會哲學，針對西方啟蒙運動所開展的理性精神予以嚴厲地批判，聲言只有不斷的反省和批判方能回復理性的真精神，才能將人從現代資本主義所迷信的科技與繁複的行政科層架構中解放出來，掙脫「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的束縛，以加速導向一種沒有不公不義的社會發展。<sup>2</sup>

被譽為「法蘭克福學派」代言人的哈伯瑪斯（Jürgen Habermas），更進一步標舉社會溝通理論，期待人類的社會文化生活，能自勞動、語言及支配的三種基本要素中，產生「技術的關懷」（technical interest）、「實踐的關懷」（practical interest）及「解放的關懷」（emancipatory interest），而在反覆的辯論中達成共識，尋得真理，而理想的生活形式，就是使「自主」與「負責」能夠充份體現的生活形式。<sup>3</sup>

無論是「舊馬」、「老馬」或是「新馬」、「西馬」，他們對人道的關懷，無不直指資本主義對人的宰制。報刊經營遭到壟斷和言論自由遭到操弄封殺，原本是極其自然而又無奈的現象。但是，新聞訊息原是人的產物，媒體亦當為提供資訊地圖的公正論壇，奈何在資本主義操控下，新聞從業人員極少享有真正的「自主」與「負責」，媒體也只是瓜分政治經濟資源的共犯，與前者都只是難以翻身的螺絲釘

而已，唯在權力與意識形態的包裝下，却能至今膨脹為制約大多數社會成員的怪物，成了反噬人類自尊、自信和自愛的怪物。這種異化現象已經使許多現代人自我放逐於真假莫辨的訊息中，而形形色色崛起中的「第二代媒介」<sup>4</sup>若不能猛然覺醒，新聞本身和媒體，都將陷身於異化的危機，破產的將不只是堂皇其表的新聞理論和大眾傳播的聖潔使命。

### (一)異化與資本主義文化

異化的概念並非馬克思獨創的見解，他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抨擊重商主義，肯定古典經濟學家的勞動價值說，要求找回勞動者整全的自我，至少批判繼承了下列人物的思想精華：一、布魯諾·鮑爾（Bruno Bauer，1809～1882）與費爾巴哈（Ludwig Feuerbach，1804～1872）對宗教批判所建構的主體主義及人本主義。二、黑格爾（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的《精神現象學》將人的自我產生，看作抽象的精神的外化，和這種外化的揚棄過程；及《法哲學原理》中剖析的私有制造成社會兩種分化，勞動與資本分離，從而使勞動異化無可避免。三、赫斯（Moses Hess，1812～1875）對金錢的鄙夷態度，企圖使人類通過實現共產主義和根除利己主義，而自資產階級罪惡中獲得救贖的使命感。<sup>5</sup>

異化在哲學的意義上，具有一般性的含義：人通過物質活動或精神活動所創造出來的產品，如商品、宗教、國家和各種意識形態等等，在一定條件下和人的主觀願望相背離，成為與人相對立的異己力量，對創造它的創造者進行排斥和危害。而在具體含義上，或具體的運用上却是各異的，既可以是唯心的，也可以是唯物的；既可以是政治的、道德倫理的，也可以是經濟的。<sup>6</sup>

將「異化」與「勞動」結合起來，作為批判資本主義的理論依據，是馬克思的創見，其原創性在於：一、在「異化」方面，他首次對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概念作出社會經濟學的解釋，並融合了黑格爾的辯證觀；二、在「勞動」方面，他將勞動概念同「生產由以進行的物質條件」結合起來，並確認生產的物質條件決定了勞動的性質，和由此產生的各種社會關係的性質。馬克思的異化勞動，是社會經濟的異化和人的異化。<sup>7</sup>

由於異化勞動的綜合性和廣義性，它不僅用以表述私有財產、商品、資本、工資、勞動力出售等等，一些經濟活動的性質，還有異己性、敵對性、貶值、喪失、貧乏、低賤、折磨、痴呆……等等精神心

理的自我感覺。而這些看起來不同類型的概念，却又處於有機的綜合和相互依賴的關係之中；它當然是被用來解剖資本主義剝削的機制，但主要還是用來說明和批判這種機制，給個人造成精神的和心理的負面後果。<sup>8</sup>

馬克思在《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為資本主義歸納了四個突出的異化現象：<sup>9</sup>

第一，在生產過程之外，作為勞動對象的產品與勞動者相異化。

第二，在生產過程中，勞動本身與勞動者相異化。

第三，在社會經濟過程整體上，勞動者與他作為人的本質相異化。

第四，在社會關係整體上，人與人相異化。

前兩者都可歸為「直接的勞動異化」，後兩者則為在勞動異化的基礎上產生的「人的異化」。馬克思藉異化分析勞動與資本的階級對立，希望將勞動者自私有制和貨幣制度中解放出來，因為對馬克思而言，不自由就是異化，而自我異化只有一種，就是人的異化。<sup>10</sup>

另在深層意義上，資本主義所倚仗的私有制，同樣也使資本家毀滅和非人化，因為資本家也處於異化世界的統治之下。產品對生產者的統治，實際上不僅影響到那本身生產著剝削壓迫自己的資本的僱傭勞動者，而且也影響到資本家，後者同樣受到自己的財產、資本這個異己力量的奴役，並因此而和勞動者一樣在自己同勞動產品的關係中被異化，差別只在於：在勞動者那裡是異化活動的東西，在資本家那裡則表現為異化的狀態。<sup>11</sup>

既然資本家也是資本主義制度下，不同程度的受害者，消除勞動異化就更富有人道主義的色彩了。

資本主義是主張私有財產，為追求利潤，在自由競爭市場中從事生產與運銷的經濟組織。而現代意義的資本主義，是指工業革命以後，因大量生產而使市場擴大，以機器代替手工，以工廠組織代替家庭生產，由經濟生活而影響政治組織的經濟型態，它從十八世紀的後期自英國陸續遍及西歐、北美、澳紐、南非及亞洲的日本，從而引發形形色色的現代化理論，與解決依賴、發展、核心、邊陲等衝突概念的思想體系。<sup>12</sup>

資本主義社會及其成員，在唯利是尚，以力取勝的生存法則下，能夠流通分享的文化資訊亦均遭制約、壓縮，文化亦成為規格化的商品，而成為阿多諾（Theodor Adorno）與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所批判的「文化工業」（culture industry），揭露了所有大眾傳播媒介均為具有相同商業目的和經濟邏輯的企業體系，其從業人

員不可能超越此一體系結構，且其存在的理由就是去肯定他們是整個文化工業的一部份，文化工業竟然成為宰制人類心靈的幫兇，令人甚至無法憬悟：自己所相信的意識形態就是奴役自己的意識形態。<sup>13</sup>

## (二) 商品貨幣形式下的新聞事業

馬克思的崇高理想之一就是追求人類的解放，而非個人、集團或某個階級的解放。但是，若僅憑《一八四四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具有人道色彩，就刻意忽略他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導言》和《論猶太人問題》中，已經強調要以全面性的革命來遂行「人類解放」，主張以暴力革命手段來消滅私有制，而不管這手段是否符合道德和人道原則的事實，恐將錯估他對暴力的崇拜與偏執，而誤認整個馬克斯主義就是人道主義；何況，在一八四八年《共產黨宣言》、《法蘭西內戰》和《哥達綱領批判》中，馬克思更將暴力革命做了全面性的論證。<sup>14</sup>本文之所以借重馬克思手稿中的異化概念，實因資本主義適應力頑強，往往令人甘於刀口舐血，出賣靈魂成為寡廉鮮恥的共犯；消除異化和適度抑制當今人類的拜金享樂的物質癖慾，似乎不能不先從左右現代人受想行識的新聞異化的病癥談起。

新聞的發生和流傳，原本不待資本主義的興起和滋潤，但工業革命後掀起的市場競爭，使得新聞採集和傳播成為專業分工的項目，替代大多數人認真地守望地平線，在廣義的截稿時限下，定期的發送五花八門的資訊地圖，成為個人和世界聯繫起來的紐帶。因此，在理論上新聞事業追求新聞真實，原本是天經地義的信條，因為口碑欠佳的報刊必然欠缺銷路，沒有銷路就沒有廣告，沒有廣告盈收就喪失繼續經營壯大的條件，因此，如何爭取獨家來吸引大眾並打擊同業的銷路，往往比追求真實的信條更為重要。

在一般大眾心中，常認為新聞事業的領導菁英和第一線的記者，既然絕大多數是新聞傳播教育制度下的優秀產品，將守望地平線和維護社會正義的重責大任交付其手，應當是穩妥可靠的。但是，敏銳的人士却經常發現新聞之中並無太多深入的報導，也看不出媒體有何長遠的理想抱負，甚至還偶爾被大眾抓到偏見或惡意的歪曲。儘管如此，電視和報紙的獲利率仍然大幅超出整個工業的獲利率，美國和所有西方報業思想所衍生的媒體，幾乎都接納了這種商業目標和價值：凡有益於發展廣告商、印刷業和廣播媒介擁有者共同利益者，就是正當良好的，反之，給該制度帶來危險的即為不可取的。如此的用人和經營哲學，使得陳義甚高的新聞倫理和編採守則，出了大學門牆就凋萎不

堪，新聞的本質和擲地有聲的使命感，立即在現實利益的糾葛中蕩然無存。

新聞界果真沒有唐吉訶德？答案是頗為悲觀的，因為對盈利的根本目標和價值公然挑戰的機率微乎其微。以美國為例，至少有三個原因造成如此的僵化：<sup>15</sup>

- 一、因為新聞工作者所處的教育制度使他們本身接受了這些目標和價值觀念。
- 二、在雇用過程中就幾乎根除了所有那些潛在的挑戰份子。
- 三、那些叛逆者即便闖進了前二道關口，最終也會由於朋友的影響，或自己本身的升官欲而被迫變得穩穩當當。

和其他任何手中未握有「第四權」的行業一樣，新聞界的好差使和晉升的機會，往往屬於那些最少惹是生非的人；部份善於獨立思考的人們，通過以上三個過程之後，便會漠視新聞媒介原應「自主獨立」的說法，其他一部份人則打消了抗爭的銳氣，改行從事別的職業。

這是媒介及其從業人員向名利和老闆低頭，向商品貨幣化的勞動形式投降，是新聞異化的第一個危機。

除了商業上的既得利益，新聞與政治現實也是關係曖昧難分。新聞成為政治的一條主軸，新聞在一定程度上改變著政治結構，而政治又在某種程度上影響著新聞的發展走向；新聞在一定程度上決定政治人物的正負形象，而政界首腦又在某些狀況下，影響著新聞界人物的沉浮。新聞界巨頭和政界首腦之間的關係，經常有互為主客的戲劇性變化，有時甚至是互不相讓，平分秋色。另一方面，兩方又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新聞巨頭不涉足政治，報紙就辦不下去，而政界首腦離開了新聞，也就不成其為政界首腦，於是，新聞媒介不再是袖手旁觀的紀錄者，它們介入形形色色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面向的決策工程，於是，新聞愈發達，愈重要，變得愈自由，也就愈深地陷入了社會政治之網，受到束縛，更闖了不少它根本賠不起，擔不了的禍。<sup>16</sup>

如此的共生關係和惡性循環，迫使本應中立客觀的媒介向權勢靠攏，乃至揣摩上意，曲意奉承，完全喪失了針砭時弊的骨氣，這是新聞異化的第二個危機。

然而，新聞異化最易被大眾察知的，是新聞從業人員的不夠敬業而怠忽職守的朦混，以及為了搶鋒頭而不擇手段的造假，此種危機不僅貶損媒體的莊嚴法相，也使此一原本不容懈怠的專業，淪為「劣幣

驅逐良幣」的反淘汰戰場。這是第三個新聞異化的危機。

稍有資歷的編採人員都曾在辦公室裡聽到高級主管如此的對話：「別怕，新聞本來就是做出來的！」「放心，擺上去就會像個頭條。」「今天缺稿，大家再想法子湊幾條吧！」「問不到底牌沒關係，就先押個寶好了！」

誠然，記者沒有天天釣到大魚的手氣，編輯也總有難為無米之炊的苦惱，但追根究柢，恐怕還是只能怪罪媒體在人才方面的投資培育不足，中堅幹部的素質又過度平庸所致。為了補版而東拼西湊，改寫編造已屬不德，為了精彩叫座而扭曲報導，誇大標題，更嚴重違反了最基本的誠信原則，於是「神聖和褻瀆的人，真實與虛偽的人，遭受奉承和辱罵的人混雜不清，使一般的美國人頭昏眼花，不能分辨。」<sup>17</sup>這段感喟，用在台灣地區的媒體表現，又何嘗不是十足的貼切？

為了考績、獎賞或更高的榮譽而造假，一九八一年四月曾捏造八歲男童吉米吸食海洛因成癮，竟騙得普立茲獎的珍妮·庫克（Janet Cooke）事件，至今猶為新聞教育耳提面命的反面教材。但是，這會是全球記者為得獎而不惜杜撰虛構的「最後一個教訓」嗎？

事實上，新聞界的統治者幾乎無日不在玩弄著「竊國者侯，盜鈎者誅」的雙重標準，因而當媒介抨擊官員貪污腐化時，新聞界本身却從未有效的拒斥來自四面八方的招待或賄賂，與股市大亨冷面作手殺進殺出以牟取短線利益者，又何止難擋誘惑的菜鳥新兵記者；無視於國家最高利益，捲入政治分贓的派系鬥爭，黨同伐異而自命清流的行徑，又何嘗比明火執仗的盜匪高明。凡此種種，皆是大眾傳播媒體成為物慾製造機中的小螺絲釘後的可悲現象；說得白話一點，就是資本主義體系下「虛偽是賺錢之本」的赤裸呈現，「順我者生，逆我者亡」的操作法則，已經使原本應該守護正義公理的新聞界，淪為製造猜忌、消滅真理的巨大黑洞。

報紙或廣播電視台可能制定嚴格的規範，禁止記者與編輯從事可能使他的公正性遭受妥協的事，但却未要求發行人、老闆或經理遵守同樣的規範。<sup>18</sup>因此，新聞扣發、封殺、淡化的最後守門人，不是真正披星戴月的資深編輯，而是符合私利的決策內容，和實際左右新聞質量的幕後黑手。這是新聞異化的第四個危機。

除了前述司空見慣的四個新聞異化的危機，辯論開發中國家如何肆應重新奠定價值的「發展社會學」，已經延展為要求擺脫依賴、扣緊本身需求的「發展新聞學」，兩者對於文化帝國主義及電子殖民主義的批判與期待，隱然成為下個世紀主宰全球資訊與傳播秩序的主戰



場。人類將走向心手相連的地球村，還是歧見依舊的為資議自由的分配法則鬥爭不已，實為新聞異化的第五個危機。

對幾乎享有世界性聯合壟斷的文化霸權成員而言，商業利潤當然是不可輕言分享或讓步的東西，而在內心深處却有獨佔科技和施捨的優越感在作祟，就像佛羅拉·劉易士（Flora Lewis）在紐約時報專欄評述「國際電信聯盟」受到低度發展國家挑戰時的論調：『……它是全球傳播網的心臟。美國沒有它也能運作；但是如果沒有「國際電信聯盟」的管制，世界體系行將崩潰，第三世界就有依賴煙火訊號和鼓聲的危險。』<sup>19</sup>

科技的躍進和移轉，果真是開發中國家遙不可及的天梯嗎？文化霸權的天神們在雲端俯視亞、非、拉美人民的時候，將科技視為西方專利，而且不願與所謂的次等民族分享智慧火種的心態，和憂慮黑黃人種報復的恐懼，才是他們踞傲冷漠自大的真正內核。吉利斯比（C. C. Gillispie）在其《客觀性的刀口》（The Edge of Objectivity）一書，有相當直率的表白：「當西方人所創造的權力工具完全落入非西方人之手時，艱苦的時代便要開始，因為那些非西方人以前是生長於對人類沒有高度責任感的文化環境之中。基督教的世俗遺產，至今仍稍稍約束著我們的世界，儘管這種遺教既變得自以為是，又在退化之中。受其他文化傳統薰陶的人，能夠而且確實佔用了我們的科學與技術，但不是我們的歷史與價值。要是中國人揮舞著炸彈，我們的日子將怎麼過？要是埃及人也這樣呢？是曙光女神照亮了來自東方的黎明，還是復讎女神？」<sup>20</sup>

世界五大通訊社：「美聯社」、「合眾國際社」、「路透社」、「法新社」和「伊塔塔斯社」傳佈大約整個世界百分之九十的資訊，<sup>21</sup>它們彼此的關係是商業利益之外還夾雜了文化霸權間的形象鬥爭的手段，有意無意間向其資訊訂戶宣揚它所認可的意識形態，却根本忘了就在自家後院乃至客廳，同樣存在著毫無二致的現象。

「美聯社」於一九九三年三月廿二日所發佈的一張照片，就反映出西方世界以關懷為名所包裝的新聞，如何夾帶了有爭議的批評。

這張照片近景是兩隻肥大的老鼠，背景為莫斯科著名的紅色廣場以及幾群步行通過的人。其說明文字為：「兩隻老鼠於星期天棲止於莫斯科紅場的克里姆林宮前，莫斯科市正為鼠輩侵擾而苦，並且根據若干報告，在這九百萬人口的城市中，有一千五百萬隻這種齧齒類動物。」台灣地區某些報紙於次日也刊出了這張黑白照片，毫不質疑這兩隻老鼠有無可能經過特別的安排？如果牠們真的如此經常毫不畏人

的在紅場附近狀似悠哉的活動，為何只有「美聯社」能如獲至寶般的向全球發佈？最重要的是：如果「伊塔塔斯社」也派專人在白宮前拍到兩隻美國老鼠在曬太陽，美國朝野還能保持高度的忍耐功力和幽默感嗎？國際傳播如果專門在這種枝節現象上打轉，所謂「新世界資訊與傳播秩序」，豈不遲早要淪陷為「國際抹黑大賽」？

再以「時代」雜誌為例，一九八三年韓航〇〇七班機遭蘇聯戰機擊落時，它和「紐約時報」同樣的大量報導美國官方的憤怒和譴責，並聲稱：任何擊落無害民航客機的國家，沒有可被接受的藉口用以卸責。但才事隔五年，美軍竟然在毫無預警的狀況下，將伊朗民航第六五五五班機擊落，同樣是全機遭殃無一倖免，但是，道貌岸然的「時代」却輕輕地放過了自己人的血腥舉措，而將肇因歸咎於整個中東地區的緊張情勢。韓航班機被 CIA 用來測試蘇聯空防虛實的真正責任姑且不談，很明顯的是：當美國人自己犯了錯誤，也開了殺戒，藉口和說詞便都能被接受相信了。吉夫·柯亨（Jeff Cohen）將此種現象名之為胳膊往內彎的「地主隊偏見」（home team bias）；亞倫·羅奇林（Alan Rachlin）則進一步分析此種偏見，實根源於當前美國的新聞機構均以支持美國霸權的視界和想像，做為他們矢志達成的編輯立場。<sup>22</sup>

這種凡是新聞都當做是美國問題的心態，並以自我經驗加以詮釋，其實只是美國人民往西部墾荒的天命思想的遺留。「新聞周刊」專欄作家梅格·葛林菲德（Meg Greenfield）將此唯我獨尊的心態形容為「智性的孤立主義」（intellectual isolationism）<sup>23</sup>。這種球員兼裁判的表現，必然會扭曲新聞的本質，使接受其資訊者在短期內無從知悉事件的真相，反而增加了許多困擾和挫折。

總結以上五個新聞異化的危機，莫不依附於資本主義的價值體系之下，亦即世界上任何東西都有價格，可以賣錢和賺錢的就是人人必欲得之的好貨色，而為了低價買進、高價賣出，當然要透過談判、宣傳和競爭，也當然包括取巧、欺騙和讓步。大眾傳播媒介和媒介中的從業人員在其出錢老闆心中，不可能只是一群只知追求事件真相和人類正義的員工，他們經常只是被貨幣計量的公司利潤，和必須不斷翻新才能賺錢的新聞商品所終日驅使。這是願打願挨的僱傭模式，原本不足大驚小怪，唯以勞動異化的角度重予檢視，方能驚覺新聞從業人員一旦賺得愈多，也就無可避免的使本身出賣更多原應堅持的專業原則，人的尊嚴也就淪為寡廉鮮恥的金色傀儡了。

如果我們將原本為人創造，而應為人服務運用的新聞橫遭操控、

壟斷和做為剝削、牟利的工具，以役使閱聽大眾和記者，視為新聞異化的內涵，其危機不難想見矣！

尤其值得省思的是：當代大學體制下的分科教育在世俗價值的濡染衝擊下，幾乎都難逃理想鬆動的厄運。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在校園門牆內所鼓吹的道德尺度和敬業精神，往往擋不住名利陷阱擺設的誘惑饗宴，新聞從業人員生涯的成敗指標，十之八九定位於取得高階行政主管權力的遲緩，以及與握有媒體所有權的金主所認可的親疏關係。台灣地區新聞媒體無法落實資深記者的制度，其實就是媒體本身以駕馭資淺者為能事的生態切片之一，採訪組避免重用資深員工的核心理由，就是要鞏衛隨波逐流的企業文化，於是在同一校系畢業的新秀，一年半載之內就能迎合不同的老闆及其各色朋友的品味，可塑性之強，差異之大，往往令人不敢相信他們竟是同門子弟。其中若有隨年資累進而幡然有所憬悟者，不是伺機轉進其他行業或跳槽，便是無可奈何的留在既有體制內，每天眼睜睜看著學術理論在實務界慘遭誤用、扭曲和無止境的貶抑。

如果新聞與大眾傳播教育是如此不堪一擊，社會大眾如何能對分秒不停的新聞資訊篤信不移？如果媒體本身就是特權的追求者及黑幕的製造者，人類社會的互信與和諧，又如何能指望媒體能在自門鬥人的狹隘格局中達成？

這些最基本的問題自始與人性本質相糾葛，恐非旦夕之間就能廓清解決。勉力澄清新聞的本質，將新聞從業人員被異化的現象還原，應該是人類邁入廿一世紀之前，大眾耳目將因新興媒介興起而更為靈活之前，必須嚴肅思考並設法實踐的社會工程。

### (三)新興媒介盛行前的基本思考

電視出現的時候，許多人憂心它將對報紙雜誌這類平面媒介產生致命的衝擊，但報刊至今仍然受到當代人的依賴，因為電視新聞報導的事件，大多數是經過安排控制的「假事件」，傳播一些政治菁英的觀點和行動，<sup>24</sup>而其畫面跳接所講求的節奏美感，特寫鏡頭所渲染的情緒，都使電視新聞帶有頗濃的戲劇成份。而在此種「看戲」的情境下，電視記者的自主性大大的超越了報社記者，為了在壓縮的時間內達成使命，他們自由的對事件進行解釋、分析和揣測，令人無法區隔何為新聞？何為評論？不同的意見和批評常無機會同步表達；更嚴重的是：報紙已能經常調查並更正報導錯誤的時候，電視新聞幾乎沒有什麼螢幕上更正致歉之舉。<sup>25</sup>

儘管電視新聞和播報者已無法擺脫流於個人化的缺陷，但長期以來被尊崇的記者形象：「薪水低但士氣昂揚的常人，在本埠版編好後和警察共飲啤酒的模樣，已經被電視所塑造的角色所取代——端坐播報台的先生或女士，冷靜、亮麗並且比總統的薪水還要多。」<sup>26</sup>這段描述當然適用於像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專訪節目的主持人賴瑞·金恩（Larry King）這樣的紅牌人物，但無論是多大规模的記或何等負責的媒體，他們能採集的也只是一場球賽中「球傳到的地方」。

表面上看來，球賽（以籃球為例）時間多達四十分鐘，但登場球員全場能將球抓在手中運傳和出手投射的時間，每個人頂多只有三至五分鐘而已，於是在某種角度而言，登場賽球者全場有半小時以上無緣碰球，但無人能說他不是奮力比賽。從記者的使命看來，「眼光跟著球走」成為唯一的採訪重心，其他球員的表現當然也會影響比賽進行，乃至左右最後的勝負，但這個比喻已可說明：記者不必萬能的制度性缺失；任何人想在新聞中找到全部真相，恐怕注定要感到失望。<sup>27</sup>

標榜「媒體融合現象」以電子學為基軸的新科技所研發出來的「第二代媒介」，在可預見的將來，將使現有大眾傳播媒介的界線瓦解，使現有的各種大小媒介彼此互動複合，產生不可限量的服務品質和形式。這些新聞媒介的開發潛力大過當年的電視何止百倍，在相對條件完全成熟後，整個改變人類社會的結構亦大有可能；目前已在試用的實例包括：文字圖形資訊網路（CAPTAIN）系統、文字及靜止畫面的多重廣播、將其印刷出來的傳真報紙（facsimile-newspaper）、收費電視、衛星廣播、雙向通信的有線電視、利用雙向文字圖形系統的電子化出版等。<sup>28</sup>

正由於科技的發展幾乎無所不能，隨著語音電腦紀錄指示的實現，及電腦模擬合成影像技巧的更臻成熟，新聞事業面臨的挑戰，不僅來自強勢的國際多媒體複合企業集團，甚至私人迷你電台也能促成「人人可以當記者，時時可以發消息」的境界。令人困惑的是：這些高科技的產品似乎只在購物資訊、餐飲消費指南的框架中打轉，要不就是既有電視電影節目的疏洪道。前「朝日新聞」新媒體責任董事三宅正也的憂慮就相當深刻：<sup>29</sup>

「各種業種加入新媒體的行列，IP（資訊提供者）充斥一時，但這些新加入者幾乎沒有一個是秉持言論自由、表現自由而去理解資訊的。現在大略觀察新媒體，讓人覺得私人的瑣碎、片斷資訊到處氾濫

，我們立志當新聞記者時那種確實掌握大狀況、形成共識的氣概，以及對社會任務的體認，都已經在淡化當中。如此下去的話，堅守民主主義的報導與言論機能，將會逐日衰弱，這就十分令人擔憂了。」

新穎的資訊科技，如何善加利用，的確是新聞界必須深思的問題。自從 ENG (Electronic News Gathering, 電子新聞攝取器) 與 SNG (Satellite News Gathering, 衛星新聞攝取器) 問世以來，電視奇兵屢創佳績，予人深刻逼真的印象自應稱許，但是，由於競爭形式更加激烈，新聞採集及播送經常遊走於倫理、法律和政商鬥爭的邊緣，「新聞界本身不夠成熟，只空有 ENG 等高度發達的器材與偏鋒走向」<sup>30</sup>美國電視的內幕報導節目例如：CBS 的「60 Minutes」、ABC 的「20/20」、NBC 的「Dateline NBC」，均透過小如拇指般的攝影機鏡頭，將人性的貪婪虛偽化為真實影像的衝擊，製成成本便宜且收視率高的電視新聞雜誌；有些節目還訴諸「秘密採訪」(clandestine) 的手段，以揭發駭人聽聞的事件。<sup>31</sup>但是，這種只追求市場的作風，很可能預設了「受訪者就是罪犯」的主觀立場，當其黔驢技窮之後，也就是新聞媒介信用破產的起點。新聞攝影機不可自甘下流，成為滿足現代人病態偷窺的打手與馬前卒，因為它「比任何報紙工具或技術，更需要對大眾的恐慌與憤慨負責」<sup>32</sup>。

新媒介的便捷固然可喜，然其設置經費過於高昂，有可能抵消其普及速度，或形成一道貴族式的壁壘或門檻，有形的拘限了資訊分享和流通。

ISDN (Integrated Service Digital Network, 整體服務數位網路) 於一九七二年由「國際電報電話諮詢委員會」(The International Telegraph and Telephone Consultative Committee, CCITT) 先提出 IDN (Integrated Digital Network, 整體數位網路) 的構想，至今不過廿年，其最終目標在讓用戶能經由單純一組用戶至網路的介面，而可隨時隨地分享各種通訊服務。根據先進國家的發展經驗，初期均以數據為主，其後圖像及影像則成為受歡迎的應用項目，例如：影像話機 (Videotelephony)、視訊會議系統 (Videoconferencing) 均為服務業和製造業帶來遠景可期的拓展空間，但因至今尚未克服價格高昂的限制，而使其「用戶終端設備」(Customer Premises Equipment, CPE) 仍停留在規範整合及實驗推廣的階段。由於 ISDN 的推廣應用不是單純的基磐建設問題，它牽涉到複雜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法律等錯綜關係，而大眾傳播媒介最有可能將其正面及負面的功能，轉化為對社會大眾的直接衝擊，因此，確有必要在其盛行勃興

前提出若干探討。<sup>33</sup>

瞬間傳送和隨時取得，是所有新媒介建構新世紀資訊社會的主要本錢，它的無所不在和無所不能的科技自信，儼然將以優越的人工智慧逐步鬆動人類既有的文明與秩序，站在人類本身才是社會及歷史主體的觀點，吾人實有必要思考四項疑問：

\* 第一，速度是否代表理解？

新媒介的高速服務可將各種具體和抽象的資訊，送達用戶手中，但用戶如何解讀運用，仍然有賴使用者的自有聰慧及能力，因此我們能將整套大英百科全書的內容在數秒內完成越洋傳送，但真正的理解吸收和逐頁有效的審視，恐怕花上一輩子的時間也沒有幾個人能絲毫不爽的做到。

\* 第二，豐富是否代表真理？

新世紀的生活方式或許就是「按鈕時代」的來臨，支持每個人言行的基本素材，很可能就是那一面隨傳隨到的螢幕資訊，唯因競相比快比多，屆時很難再有暫停思考、查證比對的餘力，更遑論在政商結構有心操縱之下，真理會有不同的面貌，為不同的利益背書，人類只會成為資訊洪流中的螻蟻。

\* 第三，便利是否代表公平？

新人類的生活便利，會有相當大的部份奠基於以天文數字的經費，才建構完成的資訊網路；以使用者付費的當然條件，和本世紀猶難克服的貧富差距問題，那種資訊均享的美麗新世界，顯然會有一堵非付錢不能攀越的門牆，屆時，是否將形成「智者愈智，愚者愈愚」的非理性社會，如何公平使用資訊？將成關鍵。

\* 第四，多元是否代表參與？

新秩序的樂觀鼓吹者會認為，新媒介不可能是廿四小時的單向監控「老大哥」，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必須順從用戶指令，乃至接納修正建議以取悅資訊的使用者。但是，面對面的溝通及固結國家社會的認同感，都不是機械文明的形制足以完全取代的；何況參與必須化為實踐和奉獻，過度強調新媒介的回饋功能，恐怕只會使多元流於數量上的虛幻，參與也只是口惠而實不至的遊戲罷了！

對新聞事業而言，新媒介的勃興意味著投資金額的大幅增加，和商業利潤的再提升，而資本主義的軀殼不變，人反被新聞資訊役使的命運也不會改變。異化的威脅既無可逃避，吾人當務之急，在更該珍

惜人類本身愈用愈靈的智性，和堅守人類道德的最後底線；能夠減輕異化的危機，被物慾宰制的宿命就有望獲得改善，人工智慧反嗜人類的悲劇就有望扭轉了。

## 結 論

馬克思主義認為，唯有以無產階級的革命消滅私有制，才能解決資本主義的毒害，使人類自異化的狀態中解放出來；但由於馬克思主義政治掛帥的結果，使得原本標榜解放的團體，最後却變質成為共黨大權獨攬的國家，成為人類異化最深的社會結構，而使「革命的神話」已因東歐及蘇聯鐵幕的瓦解而日益褪色。

相對的，資本主義所追求的「成長的神話」也因貧富差距不易泯除，社會失調和景氣循環帶來的大量失業而不再振振有辭。這兩種發展模式相互衝突的結果，均顯露了唯我獨尊的教條色彩，兩種制度下的大眾傳播媒介也都成了各為其主的宣傳工具、統治階級和既得利益者繼續鞏固地盤的利器，因此，吾人實不宜僅憑共黨勢力大退潮的表象，便宣稱資本主義行將成為一統天下的真理，因為，只要資本主義一日不放棄「剝削無罪」的心態，馬克思及近代興起的批判理論——至少在學術的位階上——依舊保有「造反有理」的發言權，無論資本主義將來如何自省修正，批判的精神仍將扮演刮垢磨光的砥石。<sup>34</sup>

至於新聞事業的經營理念，同屬人類資源應如何合理分配的話題。究竟有沒有新聞自由這回事？人類可能還得摸索一百年才會找到答案，然而，新聞自由的危機却早就迫在眉睫：在工業文明的物質主義鼓盪下，人類不思不想的循序漸進，成為政治和諧安定的保障，而新聞成了安撫現代人徬徨的鎮定劑，形式可能是每天清晨自信箱中取報閱讀，也可能是定時盯住電視的新聞時段，絕大多數的人都處於照單全收的狀態，任由新聞從業人員供應資訊的劑量；頻道和編輯政策的差異，只不過是藥丸糖衣的顏色有別而已。CNN 成為第一個提供廿四小時新聞服務的頻道後，讓電子影像更權威的凌駕於平面媒介之上，閱讀、判斷、思考的基本能力已向電視遙控器屈服。

社會學者彼得·柏格（Peter L. Berger）認為，人類的歷史乃是一部苦難史，所有倖存於世的人都是兀鷹，因為他們經歷了苦難才活下來；每一個歷史社會的基礎，皆堆砌著難以數計的屍體和歷史的祭品。為了使看似宏偉的金字塔持續增高，前仆後繼的統治者和被統治者只好繼續讓大屠殺合理化。<sup>35</sup>

在人類文明的金字塔中，新聞從業人員從來不是至高無上的統治者，亦非任人踐踏的苦力，他們的才能和性向有點類似通曉古今，而又獲欽命的祭司。人民的苦難要上達天聽，當然仰仗祭司喃喃作法，帝王君臨人間的治術也得靠他裝飾打理；人類如果要有前途，祭司一定要有悲天憫人的胸懷，不可惑於權勢，亦不可與無知暴民為伍，以防範隨時蠢動的私慾，成為壓垮人類尊嚴的最後一根稻草。

## 註 解

1. 參見陳力丹著：「談談馬克思傳播觀的開放性」，新聞學研究第四十七集，政大新聞研究所印行，民國八十二年六月，頁53。另有關馬克思對報刊使命的看法，參見「新萊茵報審判案：馬克思的發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一九六五年十月一版二刷，頁275。
2. 參見：一、徐崇溫著：「法蘭克福學派述評」，台北，谷風出版社，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台一版。二、洪鎌德著：「新馬克思主義和現代社會科學」，台北，森大圖書公司，民國七十七年十二月初版。三、高宣揚著：「新馬克思主義導引」，台北，洞察出版社，民國七十六年四月初版。
3. 參見黃瑞祺著：「哈伯瑪斯：社會批判理論大師」，聯合月刊第九期，民國七十一年四月，頁128~135。interest不僅具有興趣之意，亦有利益及關懷的層面，而此處改譯為關懷，應較興趣更趨近原意。
4. 「第一代媒介」是指報紙、電視、收音機；近年由於電腦電信傳播的結合而出現了直播衛星、電傳視訊、線纜、錄影機及整合數位服務網路（ISDN），對既有的媒介及服務型式造成難以評估的衝擊，它們被統稱為「第二代媒介」。詳見：汪琪、鍾蔚文著：「第二代媒介——傳播革命之後」，台北，東華書局，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初版二刷。
5. 參見李英明撰：「馬克思異化論之研究」，政大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七十四年六月，頁17~67。
6. 馮景源著：「馬克思異化理論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八七年七月一版一刷，頁5~6。
7. 參見宋國誠撰：「卡爾·馬克思《一八四四年經濟哲學手稿》之研究」，政大東亞研究所博士論文，民國七十七年六月，



- 頁 327。
8. 同前註，頁 347。
  9. 參見一、顧海良著：「馬克思不惑之年的思考」，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三月一版一刷，頁 172。二、詳見馮景源前著：頁 91~101。
  10. 參見隋復華撰：「馬克思論人的本質之研究」，政大東亞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七十二年六月，頁 141~142。
  11. 參見劉丕坤、王以鑄、楊靜遠合譯：「馬克思恩格斯傳(II)：1844-1845」，台北，民國七十八年，詳細出版資料未列印，待考。頁 215。
  12. 參見「雲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羅志淵主編第三冊「政治學」，頁 349，對資本主義的介紹。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國六十八年十二月五版。
  13. 張錦華著：「批判傳播理論對傳播理論及社會發展之貢獻」，收錄於朱立、陳韜文編：「傳播與社會發展」(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系成立廿五周年紀念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系印行，一九九二年七月一版，頁 25~26。
  14. 同註 5，頁 173。
  15. 參見黃煜、裘志康合譯：「權力的媒介」，北京，華夏出版社，一九八九年七月一版，頁 291~292。
  16. 參見尹向澤等合譯：「掌權者：美國新聞王國內幕」，成都，四川文藝出版社，一九八八年三月一版一刷，代譯序：「美國政權的形成：新聞與政治的關係」，頁 25~27。
  17. 這是羅森堡(Bernard Rosenberg)對美國大眾文化的批評，轉引自蕭新煌編：「低度發展與發展——發展社會學選讀」，台北，巨流圖書公司，民國七十六年四月一版二印，頁 88。
  18. 羅文輝譯：「信差的動機：新聞媒介的倫理問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初版一刷，頁 59。
  19. 鄭植榮譯：「電子殖民主義」，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一年五月初版一刷，頁 152。
  20. 范庭育譯：「大滴定：東西方的科學與社會」，台北，帕米爾書店，民國七十三年元月一版一刷，頁 339。
  21. 同註 19，頁 21。
  22. Tom Koch, "Journ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Online In-

- formation, Electronic Databases, and the News”, New York, Praeger Publishers, 1991, PP.26~27.
23. 同前註，頁 22~23。
  24. 參見黃新生著：「媒介批評：理論與方法」，台北，五南圖書出版公司，民國七十九年九月再版，頁 131。
  25. Creed Black: “Our Image Problem: A Paradox”. Believing the News. Ed. Don Fry. St. Petersburg: The Poynter Institute for Media Studies, P.234.
  26. William A. Henry III: “Journalism Under Fire”. Believing the News, P.195.
  27. Roger Rosenblatt: “Journalism and the Larger Truth”. Believing the News, P.236~238.
  28. 東正德譯：「傳播媒體的變貌」，台北，遠流出版公司，民國八十一年二月初版二刷，頁 29~32。
  29. 同前註，頁 129。
  30. 同註 28，頁 312~313。
  31. 參見陳寶蓮著：「攝影忍者力挽收視率：美三大電視網熱中游擊戰略」，中國時報，民國八十二年十一月一日第卅五版，寰宇專欄「媒體探照燈」。
  32. 此為林德斯東（Carl E. Lindstorm）在 “The Fading American Newspaper” 中的批評。轉引自羅文輝譯：「信差的動機：新聞媒介的倫理問題」，頁 219。
  33. 參見李秋薇著：「從先進國家 ISDN 的發展看我國 ISDN 未來的方向」，經濟部工業技術研究院編印「電子產業透析」，民國八十二年十月。
  34. 參見蔡啟明譯：「發展理論的反省：第三世界發展的困境」，台北，巨流圖書公司，頁 77~92。
  35. 同前註，頁 117。